



祝鴻熹 著

祝鴻熹漢語論集



中華書局

祝鸿熹汉语论集

祝 鸿 熹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祝鸿熹汉语论集/祝鸿熹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03

ISBN 7-101-03601-5

I. 祝… II. 祝… III. 汉语-古代-研究-文集
IV. H10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8916 号

祝鸿熹汉语论集

祝鸿熹著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8¹/₄·印张·187 千字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14.00 元

ISBN 7-101-03601-5/H·189

目 录

章炳麟——现代汉语言文字学的开山大师·····	1
王力先生对训诂学的新贡献·····	10
徐复先生对《广雅》研究的卓越贡献·····	17
《说文》所称“古文”中的假借字·····	23
王国维对古文献所称“古文”的卓识·····	41
论“半边字”的作用和价值·····	53
论汉字异体字的确认·····	61
从古今字看汉字形体演变与本义的推求·····	65
古文字与古文字的研究·····	70
甲文繆益字简述·····	77
《墨子间诂》校字述例·····	83
《古代汉语》教材中的“本”和“通”·····	98
章黄关于汉字“变易”、“孳乳”的论述·····	108
略谈《广雅疏证》的词义训释·····	113
《广雅疏证补正》略说·····	122
现代语文辞书呼唤训诂学·····	136
成语教学与训诂学·····	147
论成语中的古语素·····	159
汉语四字成语的意义切分·····	171
古诗文中无句读标志的句内语词的切分·····	176

偏义对举词的使用	185
《水浒传》对举词特殊用例	189
否定词的误用	196
关于“人奴”	198
论《诗经》中的“之”	200
古代汉语“倒文以成句”质疑	217
文言虚词语法作用的内部联系	225
古人名、字相应述例	233
周广业笔记四种校点本前言	239
《大字典论稿》序	250
读《楹书校注》	253
补白 “鬓毛衰”解	9
“打破沙锅问到底”	16
《石壕吏》的一个韵脚	40
介词“把”使用不当	107
契诃夫读作契 kē 夫吗?	216
后记	257

章炳麟—— 现代汉语言文字学的开山大师

——从《语言缘起说》谈起

章炳麟《国故论衡》(上)收入的《语言缘起说》一文可以看作是现代汉语言文字学开始的显著标志。

我国学者对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早在上古先秦时代就开始了。先秦诸子对名实问题的争论包含着语言理论研究的萌芽。如孔子的“正名”说、公孙龙子的《名实论》、荀子的《正名篇》。距今二千多年前的荀子,科学地论述了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辩证地阐明了词与概念的关系,进而指出了语言的社会本质。汉代出现了一系列语言文字学的经典著作。如《尔雅》、《方言》(杨雄)、《说文解字》(许慎)、《释名》(刘熙)等。中古以后又出现了《切韵》(陆法言)、《广韵》(陈彭年等)、《中原音韵》(周德清)等音韵学著作。到了清代,乾嘉学派把汉语文字、音韵、训诂学的研究推向了辉煌的高峰。西方某些学者及其门徒断言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甚至没有对语言的研究,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我国古老的传统语言文字之学一向被称为“小学”。汉代因儿童必先学习文字,故称文字学为“小学”。“小学”的范围在隋唐以后,明确扩大为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的总称。由于记录汉语的书面形式汉字的特点,决定了我国语言研究与文字密切不可分;同

时,由于历史的原因,语言文字的研究与经学也是密切不可分的。古人对语言文字的研究常常是为了识字、明经、致用。这给语言学的研究带来了消极的影响——缺乏系统的纯语言的研究。故而不少学者称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语言学为语文学。“小学”的局限通常被概括说成是沦为经学的附庸。这样说,实际上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古人摆脱汉字形体的束缚和经学内容的羁绊进行纯语言的或语音的研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由于引进印度佛经注音方法,早在东汉就产生用反切法分析汉语音节的科学注音方法。中古以后出现的细密分析汉语声韵调的韵书及声韵调相配合的等韵图,很难说是经学的附庸。尽管它们可以有有助于解经,但它们都应属独立的音韵学研究成果。总之,不能拿西方现代语言学的标准即所谓洋框框来衡量我国古代的语言文字之学。

学术是没有国界的。语言文字之学的研究不可能闭关自守。“五四”以来国外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不能不影响我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

首先提出改“小学”的名称为“语言文字之学”的学者正是章炳麟。他在1906年《国粹学报》上发表《论语言文字之学》一文。这不仅仅是名称术语的改变,而是反映了我国学者对语言文字之学的现代化的卓识。章氏因而被公认为现代汉语言文字学的开山大师。

下面我们从《语言缘起说》的论点探讨这一卓识的具体表现。该文一开始就明确指出:

语言者不冯(凭)虚起,呼马而马,呼牛而牛,此必非恣意妄称也。

章氏在日本接触到西方普通语言学学说,吸收了西方语言学

中关于语言起源于摹声和语言起源于感叹等论点。他首先举有形之物为例：

何以言雀，谓其音即足也。何以言鵲，谓其音错错也。何以言雅（鸦），谓其音亚亚也，何以言雁，谓其音岸岸也。何以言鴛鵞，谓其音加我也。何以言鶻鵂，谓其音磔格钩鞞也。此皆以音为表者也。

这是语言中名称起源于摹声说结合汉语实际的具体论述，已明显是从理论上探讨纯语言的问题。

章氏不但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同时也吸收东方文明古国印度的学说。如印度哲学里的一个派别——胜论派，音译为卫世师迦派。该派创始人羯那陀，著有《胜论十句义论》（《胜论经》），有唐玄奘的汉译本。该派将事物分为实德业三方面，指的是实体、性状和作用。章氏在《语言缘起说》中说：

以印度胜论之说仪之，实、德、业三各不相离。人云马云，是其实也；仁云武云，是其德也。金云火云，是其实也；禁云毁云，是其业也。一实之名，必与其德若，与其业相丽。故物名必有由起。

仪是表仪、标准之意。文中将胜论派所说的实、德、业作为区分事物命名的标准。用仁释人，用武释马，这种声训是以德释实。用禁释金，用毁释火，这种声训是以业释实。章氏对传统训诂学中的声训从名称缘起的角度进行解说。声训用同音词解释名物得名之由，难免有主观随意性和牵强附会之嫌。如《释名》云：“土，吐也。能吐生万物也。”（《释地》）“姊，积也。犹日始出积时多而明也。妹，昧也。犹日始入历时少尚昧也。”（《释亲属》）“宋，送也。地接淮泗而东南倾，以为殷后，若云滓秽所在，送使随流东入海也。”

(《释州国》)本来,马克思主义认为:“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性质完全是外在的。”(马克思《资本论》中译本第107页)事物的名称与性质并无必然的联系,企图找出这必然联系者,无不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但声训揭示音义联系,启发人们思考名物与名称之间相对的音义关联还是有积极意义和参考价值的。

音义确有相对关联的声训,如:

被,被也。所以被覆人也。(《释衣服》)

观,观也。于上观望也。(《释宫室》)

宿,宿也。星各止宿其处也。(《释天》)

仆,踣也。顿踣而前也。(《释姿容》)

负,背也。置项背也。(《释姿容》)

威,畏也。可畏惧也。(《释言语》)

要之,“声训”对于探索语源、词族是有启发意义的。后人取其精华,吸收其合理的内核,认识到“义存乎声,声近义通”,这是语言学上的一大进步。章氏从古音韵部同部或同类、声母相同或相近列举“天之言颠”、“火之言毁”等说明以实德业命名的由来,正是基于音义关联的认识。

《荀子·正名》云:

然则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

这里所说的天官指人的感觉器官,即耳、目、鼻、口、身。人的感觉器官对客观事物的感知、印象的异同与命名区分往往有相对的关联。这一唯物主义的观点为章氏所继承。《语言缘起说》指出:

物之得名,大都由于触受。触受之噩异者,动荡视听,眩惑荧魄,则必与之特异之名。其无所噩异者,不与特名,以发

声之语命之……语言之分，由触受顺违而起也……语言之初，当先缘天官。

这里所说的触受指刺激和感受，即指天官之感知。发声之语指没有实义的句首语气词。如自称曰我、暨(咱)、朕、台及阿阳的阿和称谓前所加的阿，对称曰尔曰乃曰若，“此皆发声词也”。可见，同义诸称谓之词，往往音同音近：或声类相同相近，或韵部相同相转。

章氏在探求语源方面有十分深刻的见解：

是故同一声类，其义往往相似。如阮元说从古声者有枯槁、苦窳、沽薄诸义，此已发其端矣……如立禺字以为根，禺亦母猴也。猴喜模效人举止，故引申之凡模拟者称禺……其后木禺之字又变为偶……偶非真物，而物形寄焉，故引申为寄义，其字则变作寓。凡寄寓者非能常在，顾适然逢会耳，故引申为逢义，其字则变作遇。凡相遇者必有对待，故引申为对待义，其字则变作耦矣。

这里把禺、偶、寓、遇、耦作为语族，是一组同源字，同从禺得声，声近义通。这是吸取了宋代王圣美“右文说”的合理内核加以有理有据的推阐。本文还指出，早在《说文解字》中已经对形声字声中有义有所觉察。章氏指出：

《说文》句部有拘、钩，𠂔部有紧、坚。已发斯例。

所有这些都启发人们了解不少形声字声旁兼表义的重要现象。章氏所说的根，就是《国故论衡·转注假借说》所说的语基。《语言缘起说》中又称之为声首：

最初声首未有递衍之文，则以声首兼该余义。自今日言，既有递衍者，还观古人之用声首，则谓之本无其字，依声托事。

这里,揭示了作为古字属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假借字,原来是后起形声字的母字。如禺是偶、寓、遇、耦的母字,章氏称之为声首。后代派生的形声字最初往往以母字兼任。如辟在上古文献中兼表譬、避、僻、嬖、闢等义。明乎此,有助于解读古籍,并理解文字源流演变。

章氏探求语源的重要著作《文始》,根据声韵转变的规律,上探语源,下明流变。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汉语字词经章氏梳理、辨析,不再是一盘散沙,而是互有关系、可以串联、有源有族的一组组词语。如《语言缘起说》中分析从辩引申各义及派生各字云:

如立辩字以为根,辩者罪人相与讼也。引申则为治讼者,字变作辩。治讼务能言,引申则为辩论、辨析。由辨析义引申则为以刀判物,于是字变作辨。由刀判义引申则有文理可以分析者,亦得是名,其字则变作辩(班)、由刀判义引申,则瓜实可分者亦得是名,其字则变作瓣矣。

其中辨字中间形体由篆文刀演变而成。辩、辨、辯、瓣等字均为由辩追加形符分化孳乳而成的后起形声字。可谓言之凿凿,井井有条。《文始》不拘泥于形体,将辩及辩属诸字进一步与八、米、番、播、遍、班诸声母相同相近、韵部相同相转之字相系联。比其声韵,析其义类,自成体系,为后代学者以现代语言学方法进一步研究语源、语族问题和同源词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章氏在音韵学研究方面的成就是很突出的。他对清代学者王念孙、江有诰的古韵分部进行了修正(见《国故论衡·二十三部音准》),对后人进一步研究确定上古音韵部有重要参考价值。他不同于以前学者“考古功多,审音功少”,而在分部、拟音两方面均有贡献。他是用汉字描写韵部音值的第一人,为现代语音学用音标

构拟音值开了先河。他对古声母的研究也有重要发明。他通过谐声偏旁、声训、异文等材料证明中古娘、日二纽上古归泥纽(见《国故论衡·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他还对上古声母进行系统的整理,得出喉、牙、舌、齿、唇五音二十一纽(注意:章氏所称喉、牙音与通行说法正相反,以见、溪、群、疑为喉音,以晓、匣、影为舌音)。他又创制了“成均(韵)图”(见《国故论衡·成均图》),进一步倡阴阳对转、韵部旁转之说。借此解释文字的引申、假借及孳乳现象,把汉字的形音义联系起来。《语言缘起说》中多处运用对转、旁转等解说字词音义关联,是有成效的。

章氏运用音韵学研究方言词语的重要著作《新方言》,可视为传统方言学的终结,是传统方言学与现代方言学之间的承前启后之作。该书汇集汉语方言词语八百余条,探求其本字和语源。吸收传统训诂学研究成果,运用声韵演变规律,以对转、旁转理论来考查字音发展,以期达到“以古语证今语,以今语通古语”的目的,使古籍中一部分难字、僻字与现代方言词语相印证,变得亲切易解。黄侃评述该书“已陈之语,绝而复苏;难谕之词,视而可识”,指出了本书精粹所在。但是,企图将今之方言词语都找到古本字是不可能的。章氏所强调的“今之殊语,不违姬汉”,也不符合语言发展客观实际。当然,章氏重视方言研究,重视活的口语词的研究,拓展了现代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范围。《新方言》中附有《岭外三州语》一篇收方言词语六十余条,记录惠州、嘉应州、潮州客家语,也用《尔雅》、《方言》、《说文》等书印证,从而考释其来源,对现代方言学研究有重要启示。

从传统音韵学过渡到现代语音学必须摆脱汉字形体的束缚。章氏一方面继承传统,紧紧抓住汉字形音义的关联。在以汉字拟音的同时,也已开始摆脱汉字形体的迷惑。如本文中长言、短言的

论述,考证蛮、闽二字本由髻转。指出:

长言为马流(原注:唐以前史籍皆作马流,或作马留,今作马来),短言为髻……髻云髻云,即马流合音耳。稍变则曰蛮,又稍变则曰闽,非必是虫类也。

这里所说的长言、短言,实即缓读、急读。缓读时把一音拉长为两音,急读时把两音切成一音。《春秋公羊传》何休注也有长言、短言的说法,两者含义有别,后者与声调有关。马流、马留、马来以及髻、髻、蛮、闽等已不能从字形求索字义。即上文提及的“义存乎声,声近义通”。这在汉语言文字研究中确是一大进步。

章氏在学术上的一大失误是过于信奉《说文》而怀疑、排斥古文字,特别是甲骨卜辞。他在《国故论衡·理惑论》中,抨击甲金文不可靠,斥之为“奉矫诬之器,信荒忽之文”,“宁可与道古邪”!这就影响到章氏对汉字本义古义的推求。如沿袭《说文》之误,确认为字本义为母猴,不明甲文为字乃役象以助劳之象形,故《语言缘起说》一文中“立为字以为根”的种种引申、演变,终成曲说。

据章氏弟子南京师大徐复教授回忆,章对古文字的态度晚年已有转变。他对甲文已不加责难。在《语言缘起说》中也引用了金文材料。如云:

发声之“维”,古彝器皆作“隹”。

“隹”即章氏所称初文、声首。由此递衍,后起形声字有维、惟、唯等。汉语言文字学为取得突破性进展,必要的前提之一,是充分运用古文字研究成果,修正传统文字学包括说文学、音韵学、训诂学由于忽视古文字所造成的失误。

总之,章炳麟是总结传统“小学”并开拓现代汉语言文字学的国学大师。他的关于语言文字学的一系列论著是一份宝贵的遗

产,值得后人整理继承,发扬光大。

(原载《先哲精神》——章太炎先生逝世 60
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鬓毛衰”解

唐代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诗: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这首广为流传的名篇,读过古诗的人都知道,其内容也明白易解。但是,“鬓毛衰”三字要准确地掌握其音义却不大容易,误解误读者大有人在。

首先,“衰”音 cuī(催),不读 shuāi(摔)。在这里,“衰”是疏落的意思。读 shuāi 音的“衰”表示衰退、衰老、衰弱、衰亡等意思。读 cuī 的“衰”表示减少、稀疏、疏落等意思。例如:“日食饮得无衰乎?”(《触龙说赵太后》)就是说“每天饮食没有减少吧?”古汉语常用词“等衰”即“等差”(cī),“衰”为等级次第的意思,由依次递减的意思引申而来。有人把“鬓毛衰”的“衰”解作发白、色白,这是没有根据的。这一误解与“鬓毛”的解释有关。“鬓毛”原指面颊两旁近耳的头发,人的两鬓因年纪大而发白、苍白,却不会稀疏脱落。拘泥于“鬓毛”的原义,就会把“衰”误解作发白、苍白。其实“衰”字本身并没有这意思。

古汉语词语常常可以灵活运用,有时部分可以指代全体,如以轮、辘指代车,以辔(驾驭牲口的缰绳)指代车马、车驾,以鳞指代鱼等,同样,“鬓毛”可以泛指头发。诗中不直接用“毛发”、“头发”,是由于绝句格律的限制,这里需要有“仄平”声的字,而“发毛”虽是“仄平”声,但语言习惯一般不这样连用,“鬓毛”较为顺口、常用,就用上了。所以,“鬓毛衰”就是指头发稀疏脱落,形容老态。

(原载《新村》1982 年第 3 期)

王力先生对训诂学的新贡献

早在四十年代,王力先生在《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发表了《新训诂学》^①一文,六十年代初,又在《中国语文》杂志上发表了《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②一文。从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王先生还在有关辞书编纂、古籍注解、古代汉语学习和教学以及语言学科的继承和发展等一系列论著中涉及训诂学问题。

在《新训诂学》一文中,王先生对传统的旧训诂学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既肯定了传统训诂学的功绩,又指出了它的局限:传统训诂学的纂集派对古代经籍故训有收集、保存之功,注释派对古代经籍故训有补正、引证之功,发明派冲破古代训诂拘于字形疏于音韵的局限,开辟“义存乎声,声近义通”的新路,创获良多。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可是,纂集派有杂引故训之弊,注释派有拘守故训之弊,发明派则有滥用“一声之转”之弊。不论哪一派,旧训诂学的立足点都是“小学为经学的附庸”这一旧观念。各派最大的局限是尊经崇古,材料的范围局限于先秦两汉,治学的目的局限于明经或明古,汉代以后的特别是后代新起的字义、词义、语义不屑于论及。总之,缺乏历史的发展的观念。

王先生深刻地指出:“从历史上去观察语义的变迁,然后训诂学才有新的价值”,“等到训诂脱离了经学而归入了史的领域之后,新的训诂学才算成立。到了那时节,训诂学已经不复带有古是今非的教训意味,而是纯粹观察、比较和解释的一种学问了。”^③王先

生为新训诂学的创立和发展开辟了途径,奠定了基础。

建国以来,王先生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他是我们的前辈学者中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批判继承传统语言学遗产以求古为今用并引进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以求洋为中用的杰出代表和光辉典范。

为新训诂学的建立和健康发展,王先生特别强调两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历史观点和语言的社会性观点。

所谓历史观点,就是要把语言现象放到历史中去考察,对于每个词义都应该去研究它在什么时候产生,什么时候死亡。要“把语言的历史的每一个时代看作有同等的价值。汉以前的古义固然值得研究,千百年后新起的意义也同样地值得研究。无论怎样‘俗’的一个字,只要它在社会上占了势力,也值得我们追求它的历史。”^④建国以后俗语词研究和近代汉语研究的蓬勃兴起正是遵循这一正确观点所取得的进展。王先生十分注意古今词义演变的“微殊”(细微差别),这是较之“迥异”更难觉察更易忽略的。他说:“从历史上观察语义的变迁,我们首先应该有明锐的眼光,任何细微的变化都不能忽略过去。”^⑤他经常用大量浅显的实例为初学古汉语的青年讲解古今词义演变的这类现象。

王先生无论在训诂理论还是训诂实践中一贯坚持历史观点是卓有成就有目共睹的。奇怪的是几年前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古代汉语·常用词〉订正》一书批评王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常用词”部分“断定词的历史时代往往不符合汉语的历史事实”^⑥,声称“断定历史时代的常用词”“错的占了80%以上”^⑦,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这里有必要附带澄清一下。原来该书所认定的两大前提是极大的误解,因而“违反历史事实”、“断错了时代”、“缩短汉语光辉历史”等一连串指责显得“无的放矢”。该书首先认定《古

代汉语》教材“常用词”各义项的第一个例证必是最早的书证,然后举出早于此例证的先秦书证来加以驳斥诘难,根本不顾教材凡例中早已申明的“常用词举例尽可能举文选中已经读过的或将来会读到的。”^⑧其二,该书认定教材所称的“后起义”必是汉以后才出现的,先秦或距先秦不远的均不算后起义,然后举出先秦两汉的书证来加以驳斥诘难,无视对本义而言的后起义,完全可能在先秦两汉已与本义同时存在。其实,《订正》一书所理解的“后起义”教材称“晚起义”,一般指时代较晚,先秦尚未见到的。至于晚至何时起,所举选自教材的书证并非起点标志。如教材第四册常用词“遍”的第二义项“周而复始为一遍,一次”,注明为“晚起义”,举了该册文选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词为例。^⑨《〈古代汉语·常用词〉订正》一书竟据此断言教材“坚持动量词‘遍’是宋朝才产生的晚起义!”^⑩这样的逻辑推理,实在令人惊讶和难以接受。

所谓语言的社会性观点,就是指语言属于社会现象,“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词的意义是被社会所制约着的。”^⑪《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一文紧密联系古书注解、辞书编纂和古汉语教学实际就正确运用训诂学原理、方法和防止其流弊提出了一系列原则性问题,其中核心的问题即语言的社会性这一原则问题。王先生据语言的社会性原则批评了前人和现代学者在训诂学工作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其中最大的流弊莫过于古音通假的误解和滥用。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学家们不墨守传统训诂学的成规,能摆脱汉字形体的束缚,重视音义联系,广泛应用古音通假的办法对古籍进行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但是到了乾嘉学派的末流,滥用通假,甚至把古音通假的范围扩大到一切双声叠韵。王先生指出:“真理走过了半步就是错误。善用通假,就能作出很大成绩;滥用通假,那就错了。”^⑫俞樾解释《诗·魏风·伐檀》中“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